

2013 ~ 2014

中国当代文学现场

ZHONGGUODANGDAI WENXUEXI ANCHANG

王春林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中国当代文学现场

(2013 ~ 2014)

王春林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6N01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现场. 2013~2014 / 王春林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6. 4

ISBN 978-7-5613-8395-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
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671号

中国当代文学现场 (2013~2014)

王春林 著

出版统筹 郭永新

责任编辑 舒 敏

封面设计 李 飞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9

插 页 2

字 数 348千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395-7

定 价 6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85303879

面对现场的批评活力

（代 序）

王春林近年来在文学批评领域风生水起。他的勤奋、热情和才华都让人惊异，也有人惊异于春林大器晚成，其实春林出道已久，早年就出手不凡，只是现在他的风头实在太足，与他早年的低调形成鲜明对比。春林也可说是奇人异相，按郭宝亮先生的说法，读春林的文章，娟秀雅致，想像他该是个白面书生，宝亮先生第一次见到春林就“大吃一惊”，原来“春林相貌高古，一部美髯，平添了多少虎虎英气，本该是个舞枪弄棒的，却偏偏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宝亮先生的经验相信不少同行朋友都有同感，我也不例外。春林相貌伟岸，毕竟要在他的性格和处世风格中体现出来，他写起文章来也如风卷残云，在他古雅清峻的文字背后，还是透示出一股豪气。用宝亮先生的话说，就是“刚健雄浑，纵横捭阖”。

近年来，春林在《长城》杂志撰写专栏，几年下来，已经积攒了厚厚的一大本，成书已然是蔚然壮观。说起来，略早几年，我也在《长城》杂志上写了几年的专栏，这就对春林的文字有特别关注。写对当前文学最新现象发言的专栏是不好干的活，每到时间就要交上稿，且《长城》是大型杂志，文章的体量和质量都要有高标准。主编李秀龙先生是文学圈公认的大好人，他对人的信任、他的诚恳和认真，让你绝对不可松懈。我坚持了几年就觉得吃力，想去春林年轻体健，才气充沛，他这一写就有数年。

春林这里结集的文学批评文章命名为《中国当代文学

现场》，可以想见它的当下性和即时性。它的可贵正在于此，这也是春林在当今文学批评中最为独特最为出色之处。今天的“当代文学批评”其实内里包含的内容至少分为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下批评两大类型。这是因为当代文学的时段已然有了六七十年，也是因为高校当代文学这门学科已经蔚然成了气候。在这样的格局中，当下文学批评实际上并不十分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当代文学划归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里，形成学科是以现代文学为基础，也多半是以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为主导方法，故而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数要远多于关注当下文学创作的群体。学科建制、课题以及教学，都使“当代文学批评”经常混淆在文学史研究中而被淹没。从事当下文学研究的批评家，相比较高校里研究文学史的人群来说，那要少得多。像春林这样及时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给予迅速的反应，广泛涉猎，敏锐品评，当是极为难能可贵。他关注的作家不只有几位名师大家，他也尤其关注年轻新锐，甚至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只要有新意，有所突破，他会及时给予评介。

当然，一个时代的文学是由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支撑起来的，文学史最终的淘汰也只会留下少数公认的经典作品留下来。而那些在当时能获得大名声的作家，能够被留下来的概率要大得多。故而文学批评家首要的功夫要下在讨论最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上面，这才是建设性的文学批评。考验一个批评家的能力是他对大作家的把握能力，对优秀作品的阐释能力。正如特里林所说，我只谈论最优秀的作品。这或许有些绝对，这在美国是行得通的，在中国或许就要兼顾其他。当然，特里林作为最优秀的批评家，他只谈论最优秀的作品这也未尝不可。在这方面，王春林不只关注新锐，他也多有关注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论，一直跟踪重要作家作品发言。记得前些年王春林有写过批评张炜《刺猬歌》的文章，敢于直言不讳，指出批评，其志可嘉。尽管今天看来，春林的观点也不无偏颇，例如，如何看待作家不同叙述风格变换的作品？如何看待作家超越自己的尝试？如何看待汉语文学的多

样性和个性化？批评家在对作家作品提出批评时，可能需要更为宽广的理解。这本文集中，春林又有多处讨论张炜的新近的创作，他的评价就中肯宽广深刻得多。不管如何，春林始终关注重要作家的批评视野是值得肯定的，也正因为此，他熟悉那些重要作家的创作轨迹，对他们的创作变化能给予细致而精到的分析。讨论贾平凹的创作的评论文章不少，春林有独到见解。他能在《秦腔》与《高兴》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他看出它们二者“具有着孪生的性质”。《秦腔》中乡村世界的凋敝，构成了《高兴》中的刘高兴涌入城市打工。由此揭示了贾平凹这样的作家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进入了当代中国现实的困境深处。由此前提，春林去阐释贾平凹的近作《带灯》就显示出贾平凹创作轨迹与中国社会现实更内在的关联。因为乡村的凋敝衰败，《带灯》的“维稳”主题就显示出中国现实更深的困境。

作为一个批评家，春林有很敏锐和准确的现实感、时代感，这非常重要，他的批评和阐释建立在对当今现实的深刻体认方面。批评家不仅仅要坚持自我的美学标准和立场，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当代文学史的前提，理解中国现实的复杂性，理解作家创新的意义所在。固然批评鞭挞那些虚假低劣之作的工作很有必要——其实这些作品会自生自灭；但批评家更重要的工作是发现文学，“发现文学”就是在发现优秀作品时才能拓宽文学表现的边界，拓宽文学表现人类生活的边界，优秀的作品在很多时候都是“越界”之作，批评家只有比作家看得更远、更宽广，才会看到作家创新触及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才会认识到其中丰富性，并且有效地阐释出来，在文学史的语境中肯定下来。

相对于关注几位重要作家，春林的优势在于解析最新的文学现象。春林令人惊叹的批评才能更多体现在他对当前大量新作的及时反应上。其阅读量之大，反应之快，写作之及时，在当今专业研究者中无疑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些即时性的批评中，可以看出春林相当好的艺术敏感性，他能从新作中看出每部作品新的

质素，给予每部作品以独特的定位。这些评论该表扬就表扬，该批评就批评，说得中肯精到。作为同行，我时常会惊叹春林保持的饱满的情绪（甚至可以说是激情），就如我们垂垂老矣，已经很难对大量新涌现出的文学现象保持书写的热情。若无批评的激情，若无对文学还保持的那种挚爱，很难想像春林有如此敏锐去写作那么饱满的批评文字。

春林的可贵在于，他品评新的文学现象并不做泛泛之论，能抓住要点，掘进很深。例如，对张楚的短篇小说《野薄荷》（2013），春林的分析从故事的逻辑关系入手，揭示小说构思的奇巧与人物关系变异，同时进行文学史的深度解析，在“底层叙事”的现代传统之下，去审视张楚的独特之处，去看这篇小说超出前人之处。春林认为，张楚的“底层叙事”可贵之处，就表现在对于“复杂性的某种回归”。不过难度也是在这里，作为即时的评论，不可能有更多的篇幅深入下去探讨，今天的“底层叙事”，固然有中国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作为依据，有20世纪左翼文学传统作为指引，但“阶级论”、贫富对立、为富不仁这些概念化、公式化的旧有资源的表述，如何释放出新的时代意义，这其实是当代中国文学陷入困境的一种表征。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新的人伦关系并未建立起来，“底层人”不只痛恨富人，同时也陷入了相互仇恨，张楚的《野薄荷》或许包含着对“底层”更复杂的批判性。弱者之间的残害和杀戮，可能更加可怕。张楚触及到了，并且做了一定程度的发掘，这也是可贵之处。春林的评论引导我们去关注当代小说如何有能力打开新的面向。

春林的这本书，评品的对象不只是小说，还有散文和非虚构作品，春林关注不同体裁的作品，可以看出本文集的丰富性。其实本文集可以当作近年文学现场的最生动概括来看，春林点评到的这些作品，可以看成展现出当代文学的一个富有活力的侧面。例如，路内的《天使坠落在哪里》，吕新的《掩面》，阿云嘎的《满巴扎仓》，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叶兆言的《很久以来》，张翎的

《阵痛》，方格子的《留守女人》，李爽的自传《爽》……这么多作品，春林都以他独有的方式提炼出小说的主题，归结出最重要的故事和人物，他的分析既有真知灼见，也有趣味生动的欣赏；既有尖锐的思想批判，也有联系生活经验和现实实践的诸多感想，使得这部文集精彩纷呈，活力十足，读来肯定让人受益匪浅。

当然，这部作品着力于当代文学现场的勾勒，并未追求当代文学问题的提炼和学理方面的深究，如果要在在这方面提出苛求自然不难。但是，当代文学研究可以有多种方法，文学批评亦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切入，春林也同时在写不同的著作，有些做课题的高头大章自然去体现他的学术强度，但这部书却是有着新鲜的活力，有着面对当下的勇气和热情，有那么多细致的分析和真知灼见，我想有这些就足够使这部著作成为一部当代文学批评的可贵之作。

是以为序。

陈晓明

2015年11月29日

于北京万柳庄

目 录

001 现实苦难、残酷历史及其他

贾平凹《带灯》/ 彭小莲刘辉《荒漠的旅程》

阿乙《春天》/ 王蒙《明年我将衰老》

毕飞宇《大雨如注》

032 罪与罚以及精神救赎

李摩诘《鲁迅》/ 张翎《唐山大地震》

艾伟《盛夏》/ 孙频《一万种黎明》

张楚《野薄荷》/ 鱼禾《父老》

067 社会现实的关切与思索

韩少功《日夜书》/ 王蒙《这边风景》

姚鄂梅《西门坡》/ 季栋梁《良民李木》

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迟子建《晚安玫瑰》

葛水平《河水带走两岸》

106 精神困境的诘问与艺术表现

马原《纠缠》/ 苏童《黄雀记》

余华《第七天》/ 张浩文《绝秦书》

乔叶《认罪书》/ 胡学文《奔跑的月光》

温方伊《蒋公的面子》

149 “非虚构文学”及其他

阿来《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 寓真《张伯驹身世钩沉》

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李浩《镜子里的父亲》

蒋韵《朗霞的西街》/ 弋舟《而黑夜已至》

陈河《獠》

192 暧昧不明的现实与批判的艺术

阎连科《炸裂志》/ 田耳《天体悬浮》

陈河《在暗夜中欢笑》/ 路内《天使坠落在哪里》

柳营《我之深处》/ 吕新《掩面》

张炜《卖礼数的狍子》/ 须一瓜《第五个喷嚏》

钟求是《送话》

238 题材多样化与人性救赎的可能

阿云嘎《满巴扎仓》/ 严歌苓《妈阁是座城》

张欣《终极底牌》/ 叶兆言《很久以来》

余一鸣《种桃种李种春风》/ 张楚《野象小姐》

杨小凡《寻找花木兰》

280 女性命运的书写及其他

张翎《阵痛》/ 方格子《留守女人》

李爽《爽》/ 弋舟《所有路的尽头》

陈冲《紫花翎》/ 孙频《假面》

322 社会正义、学术与一代人的精神分析

王手《斧头剃了自己的柄》/ 刘醒龙《蟠虺》

徐则臣《耶路撒冷》/ 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

须一瓜《老闺蜜》/ 王小妮《1966年》

张惠雯《岁暮》

364 《空巢》《黑白》与布尔津的“三重奏”

薛忆沩《空巢》/ 储福金《黑白（白之篇）》

张好好《布尔津光谱》/ 宁肯《三个三重奏》

舒晋瑜《说吧，从头说起》/ 鲁引弓《隔壁，或者1991年你在干啥》

406 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不同精神姿态

贾平凹《老生》/ 关仁山《日头》

王蒙《闷与狂》/ 薛舒《远去的人》

陈应松《滚钩》/ 陈蔚文《室友卢爱华》

449 后记

现实苦难、残酷历史及其他

2013年初，最值得我们关注的长篇小说，应该是贾平凹这部具有强烈现实情怀的《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放眼新时期文学，能够如同贾平凹这样不仅拥有巨大的创作数量，而且其作品长期保持较高思想艺术水准的作家，其实并不多见。在我的理解中，《废都》《秦腔》《古炉》以及这部《带灯》，代表了迄今为止贾平凹长篇小说写作的最高成就。《带灯》的引人注目，首先在于其对于现实苦难的艺术关注与呈示。尽管说早在阅读作品之前，就已经有了足够的精神准备，但贾平凹在《带灯》里对于当下时代乡村现实冷酷一面的尖锐揭示，对于笔下那些人物精神困境的有力表现，却还是让我倍感震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一种突出的艺术效果，与贾平凹对于乡村世界的熟悉和思考程度有关：“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即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两旁的树和一些小区门前的竖着的石头，我一眼便认得哪棵树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树是从农村移栽的，哪块石头是关中河道里的哪块石头来自陕南的沟峪。可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着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解决了，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屎，或者见怪不怪，

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①从小说后记中的这段话，我们就不难看出，实际上，尽管贾平凹对于乡村生活已经足够熟悉了解，但长期以来，他却一直紧密关注着乡村生活所发生的最新变化，并且要力争以如同《带灯》这样的作品把这些变化以及他自己对于这些变化的深度思考与认识传达给读者。

只要把贾平凹那些事涉乡村的长篇小说罗列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被高度浓缩后的一部“简史”。写作于1980年代后期的《浮躁》，书写的是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时期的乡村生活。在经过了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的长期折腾之后，乡村世界终于步入了一个正常发展的快车道。虽然说也出现了各种复杂的矛盾冲突，但从总体上说，身处改革开放时代的农民还是扬眉吐气精神昂扬的。但是，仅仅过了十多年的时间，到了2005年出版的《秦腔》之中，乡村生活就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恶化：“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②贾平凹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复杂的一种感受，正是缘于在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之下，曾经一度朝气蓬勃的乡村世界已经陷入了某种空前凋敝的惨苦状态。一个有力的例证，就是村里边有人要下葬时，居然凑不齐抬棺材的青壮小伙。在很大程度上，唯其因为乡村现实已经处于凋敝的惨苦状态，所以，才会有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被迫离开故土，进入城市，试图以打工的方式寻找出路。这样，自然也就有了贾平凹那部专门描写打工农民苦难生活的《高兴》的写作。某种意义上，《秦腔》与《高兴》具有孪生的性质。所谓“孪生”，就意味着正

① 贾平凹《〈带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② 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4月版。

因为有了《秦腔》中乡村世界的凋敝，也才有了《高兴》中的打工。但反过来，也正因为刘高兴他们纷纷涌入城市打工，所以清风街才愈益凋敝衰败了。接下来，就是这部《带灯》了。虽然说刘高兴们早已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打工，虽然说清风街早已是一片凋敝，但无论如何，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乡村世界都不可能因以上种种缘由而消失。那么，当下的乡村现实中，最为关键紧迫的社会问题又是什么呢？尽管说不同的人可能提供不同的答案，但如何采取有效的方法维持社会的稳定，也即做好我们平时所谓的“维稳”工作，恐怕却是最关键紧迫的问题之一。而贾平凹的《带灯》，则正是这样一部以“维稳”工作为叙事聚焦点的密切关注乡村现实的长篇小说。

为什么要“维稳”？关键就在于基层乡村实际上存在着太多的问题。问题多了，必然会影响稳定。于是，怎么样维持社会的稳定局面，自然也就成了各级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并且形成了“维稳”工作一票否决的基本规则。对于这一点，贾平凹在《带灯》中有着直接的揭示：“以前镇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催粮催款和刮宫流产。后来，国家说，要减轻农民负担，就把农业税取消了。国家说，计划生育要人性化，没男孩的家庭可以生一个男孩了，也不再执行计生工作一票否决的规定。本以为镇政府的工作从此该轻省了，甚至传出职工要裁员，但不知怎么，樱镇的问题反倒越来越多，谁好像都有冤枉，动不动就来寻政府，大院里常常就出现戴个草帽的背个馍布袋的人，一问，说是要上访”，“根据形势的发展，镇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维护社会稳定上。镇政府于是成立了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既然“维稳”工作如此关键迫切，俨然已经成为当下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把“维稳”作为《带灯》的叙事聚焦点，并由此而深入展开对于当下乡村现实的真切扫描，也就成了贾平凹的一种必然选择。具体来说，贾平凹这次把自己的关注点集中到了樱镇这样一个镇政府身上。众所周知，在中国现行与乡村有关的行政序列里，乡镇政府属

于最基层的一种行政建制。尽管说也存在着村一级政权，但所有的村干部，他们自身的身份依然是农民，并不属于国家干部。也正因此，最起码从理论上说，我们所实行的是一种“村民自治”制度。之所以要搞村民选举，就与这种“村民自治”制度有关。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种村民选举其实存在很多问题。对于这一点，《带灯》中，同样有着相应的描写再现。既然是“村民自治”，那么，乡镇政府也就成了直接面对农民的最基层的一级政权。这样，面对乡村社会中发生的一切问题，首当其冲者，就是乡镇政府，是乡镇政府中的那些工作人员。贾平凹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关注点集中到樱镇这样一个镇政府身上，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更进一步说，贾平凹的关注点，更在“维稳”工作，更在镇政府下设的综合治理办公室。“维稳”工作到底有多么重要？只要看一看竹子罗列出来的综合治理办公室面临的工作任务，就可对此有一目了然的了解：“一、要扎实细致地做好全镇村寨的矛盾纠纷的排查和调处。二、要及时掌控重点群众和重点人员。三、要下大气力处置非正常上访。四、要不断强化应急防范措施。”在这样的四项总体原则之下，竹子更是耐心细致地罗列出了多达28项的“樱镇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其中大多都是围绕土地、林木所发生的纠纷问题，以及乡村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既然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一年内的上访案例就达到了这么多，那么，上访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与重要，也就是可想而知的。细读《带灯》，就可以知道，贾平凹在小说中写到了许多个上访的个案。对于这些个案，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一予以罗列分析，这里只能对王随风的上访情况稍作展开。王随风为什么要一再上访呢？却原来，她在县医药公司承包了三间房做生意，很是赚了一些钱。但后来医药公司职工下岗要求收回房子，而与王随风签订的租房合同却并未到期。在未征得王随风同意的情况下，医药公司不仅硬性单方面终止合同，而且还强行把她的东西扔到了外边。“三年半前打官司，对方给予补偿，她不同意，走了上访路。县上曾想结诉给她七万元，她仍不

行，要十二万。事情就这么拖下来。”照理说，既然双方签订有合同，就应该严格按照合同办事。从这一点看，医药公司显然属于理亏的一方。县上曾经想以七万元的赔偿了结此事，而王随风提出的要求却是赔偿十二万。尽管表面上看来，王随风实在有点不识抬举，很有一些狮子大张口的味道，但从根本上说，此事的主要责任却在于医药公司的单方面撕毁合同。从法理的角度来说，无论王随风提出怎样过分的要求，违规者都只能接受。即使实在无法承受，也应该进行多方面的说服工作。但从小说中王随风的实际遭遇看，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在双方谈判无果，王随风执意上访的情况下，镇政府实际上采取了一种非常野蛮的手段应对王随风的上访行为。

“村长就对王随风说：我可认不得你，只认你是敌人，走不走？王随风说：不走！村长一脚踢在王随风的手上，手背上蹭开一块皮，手松了，几个人就抬猪一样，抓了胳膊腿出去。从过道里抬到楼梯口，王随风突然杀猪一样地叫，整个楼上都是叫声。”既然对调解处理结果不满意，王随风就有上访申诉的权力。但她的上访所遭遇到的却是一种非人的对待。请一定注意以上所引话语中诸如“敌人”和“抬猪”这样的语词。明明是讨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农民，结果却被当做“敌人”来看待，被像对付畜生一样随意处置。通过这样的描写，我们就可以略窥樱镇镇政府的“维稳”工作之一斑。在这样的描写过程中，贾平凹一方面真切地揭出了当下乡村社会存在着的严重问题，另一方面却也生动展示着如同王随风这样普通乡民的严酷生存状态。

尽管王随风的上访遭遇已经足够悲惨，但更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却是另一位被称为上访专业户的王后生。虽然说从王后生的包揽上访行为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一人物身上存在着的某种国民劣根性来，但话又说回来，王后生之所以能够处处插手上访事件，关键原因还在于客观上就存在着这么多不公平的上访事件。王后生在《带灯》中的重要性，就在于由他而牵连出了一系列大事件。仅就这一点来说，这一人物的结构性意义也是不容忽略的。王

后生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由他而牵连到了大工厂。当下时代，就实质而言是一个经济时代无疑。贾平凹的书写，当然不能忽略这一方面。对于大工厂之进入樱镇的描写，就在凸显着经济时代的特征。但王后生却起意要去告大工厂。为什么呢？“他说，樱镇交通这么不便，大工厂为什么能选择建在这里？是这个大工厂生产着蓄电池。蓄电池生产是污染环境的，污染得特别厉害，排出的废水到了地里，地里的庄稼不长，排到河里，河里的鱼就全死。大工厂是在别的地方都不肯接纳了才要落户樱镇的。”借助于王后生要告大工厂，贾平凹实际上非常巧妙地写出了两个方面的复杂性。首先写出了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纠葛。一方面，樱镇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得设法发展经济。要想发展经济，如同大工厂的落户建设，恐怕就是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大工厂的建设与否，不仅直接关系着樱镇的经济的发展，而且也还直接影响着书记与镇长他们的仕途升迁。但在另一方面，大工厂的建设，就意味着自然环境的被破坏。就此点而言，王后生关于大工厂所带来危害的描述绝非危言耸听。这样的一种矛盾纠结，不仅仅是樱镇，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有着极大的普遍性。其次，贾平凹还写出了王后生人性构成的某种复杂性。一方面，正所谓无利不起早，作为一个专业上访户，嗅觉格外灵敏的王后生，非常清楚大工厂的建设对于书记镇长仕途升迁的重要性。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说，只有紧紧抓住大工厂不放，王后生才可能求得上访利益的最大化。但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能简单断言，王后生的上访就仅仅只是着眼于自己的个人利益。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位樱镇农民，从内心说，王后生当然不希望看到自己本来山清水秀的家乡被严重污染。凭借着如此一种私心与公愿的纠结缠绕，贾平凹就活脱脱地写出了王后生真实人性世界的某种复杂性。

之所以说王后生这一人物具有结构性意义，就是他的因大工厂事件而上访，又勾扯出了樱镇的元家与薛家两大家族之间的恩怨纠葛。大工厂在樱镇的落户建设，不仅影响着樱镇的自然生态环境，